

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和实践的新进展

——中国西南、西北、中南三大区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第五次研讨会综述

中国三大区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秘书处*

中国西南、西北、中南三大区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第五次学术研讨会前不久在西安市召开。这次由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承办的会议共收到论文四十余篇,全国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新闻单位八十多位代表参加了这次学术研讨会。大会主要围绕着区域经济发展与西部大开发的主题,并对契约理论、经济学方法论和宏观经济增长等相关热点问题进行了交流和讨论。

1. 区域经济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建立以来所执行的总体发展战略就是动态的均衡-非均衡-协调发展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从动态的角度来考虑,随着时间的迁移,社会经济、政治因素和社会发展目标的变化,或者选择均衡区域发展战略;或者非均衡区域发展战略,例如东北(20世纪50年代)、西部三线(60年代)、东部(90年代)、西部(21世纪初)乃至深圳、上海浦东都扮演过非均衡推进角色;或者协调的区域发展战略,例如“西部加速、东北攻坚、东部保持、东西互动、带动中部”三极联动战略。这三大区域发展战略在不同历史阶段轮流突出。但是,无论怎样变化发展,非均衡是手段,均衡、协调发展和东中西互动是目标,这是贯穿于每个历史阶段区域发展战略的中心环节。这是中国对五十多年来社会主义现代进程中实施区域发展战略宝贵经验的总结。

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三大区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召集人颜鹏飞教授首先阐述经济增长极和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的最新进展。他在学界首先提出“区域协调型增长极”概念,并对其定义、性质、特点作了界定。他认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既具有动态性,即均衡、或非均衡或协调发展三大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轮流突出,又具有协调性,注重缩小差距、优势互补和协调发展。因此,抉择和培育“协调型增长极”,有助于熨平东北、东部和中西部三大区域差距,有助于形成同质化和一体化的大中国经济区域,其典型就是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三大经济增长区;香港-澳门-珠江三角洲区域协调型经济增长极,上海-武汉双核型模式,尤其是“一圈二带三区”为骨架的东中西部结合区,亦即中国最大的区域协调型增长极是第四个中国经济发展极。其积极意义是必将大大提升中国整体对外开放的层次和水准,因而也必将成为21世纪中国经济崛起的脊梁。

华南师范大学的刘志铭博士以新兴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和“倒U假说”为基础,指出当前我国区域经济的平衡增长必须考虑到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的特点,尊重市场经济下区域发展平衡与不平衡的内在规律。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的蔡彤博士考察了在新古典理论基础上的增长趋同理论演变过程,进而在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指出由于地区间的初始条件的差异,我国各区域经济不会出现普遍的区域趋同现象,会出现俱乐部趋同而地区之间趋异的趋势。所以,为了实现我国各地区之间的平衡发展,必须创造实现经济增长趋同的条件,并指出了人力资本初始禀赋、制度安排和地方政府职能定位对于改善经济增长初始条件的重要性。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傅红春教授通过对于中美之间“州府小城”与“州府合一”现象的对比,得出两点启示,即一是消除“城市官本位”,因为“城市官本位”会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负效应。二是发展以大学为城市的支柱产业,因为大学产业具有“增长极”的效应。

湖南大学经贸学院的王耀中教授和刘志忠博士分析了西部发展与东部发展不平衡,尤其是近几年中东西部在吸引外资方面差距有拉大趋势的原因。他们认为解决的方法是西部通过大量引入外资并购投资,加快对西部大中型国有企业资产重组,降低外商投资的固定成本。

武汉理工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魏龙教授通过分析要素贡献模型,认为区位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影响最大,同时提出下述问题:西部地区在工业化的过程中,由于从地理上限制了外资的流入,西部如何选择外资,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项目才适合西部?是否要按照东部的模式发展工业化?他强调指出,西部应该发展自身的特点这样才能摆脱地理因素的影响。

武汉大学经济学系文建东副教授从经济地理学和商品要素流动的角度探讨了东西部地区不平衡发展的机制。他认为,目前已经到了开发西部的良好时机,并认为西部的经济发展要摒弃资源开发型发展思路,也不能寄希望于过多地依赖国家的财政支持,而应该以市场化为导向,改进制度环境,提高人力资本存量,利用东部资本。

2. 西部大开发。西部正是中国贫困问题最严重的地区。有强烈的民本指向的中国政府在2001年提出西部大开发的

* 许港、赵鑫和史耀波执笔。

口号,国家财政投入也极其巨大(投入资金占近年来国债发行总量的1/3以上),但并没有搞大跃进式的开发,而是抓住了资源和生态两大要素进行大笔的投入。西气东输、三峡工程是以资源为中心的投入,而退耕还林还湖和沙漠治理是以生态为中心进行建设。如何促使西部地区经济快速、健康发展,成为本次理论研讨会的热点话题。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永秀教授和严汉平博士通过对新型工业化内涵和特征的分析与界定,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加快西部地区工业化进程、实现西部经济跨越式发展、实现西部经济可持续发展和西部地区优秀资源得以有效配置的需要。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理顺政府调节与市场调节、资本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高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和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关系。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陈佳湘同志对西部地区主导产业进行了分类,将其主要分为三大部分。一是目前成为西部经济主要支撑的产业,如能源产业、采掘业。二是目前技术水平低但前景较好的产业,如西部特色农业产品、传统的种植业和畜牧业等。三是目前比较幼小但是技术水平高,发展潜力大的产业,如旅游业、有色金属冶炼业、航空工业等。他认为应该处理好主导产业与非主导产业的关系,只有在协调发展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从整体上促进西部经济发展。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张元智老师和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马鸣箫老师,通过对陕西省户县纸箱制造产业集群化现象的考察,提出了在进行西部大开发中,应该以竞争优势和产业集群的观点为主线来思考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并以整合区域资源、培育和发展产业集群作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规划的主要内容。他们认为“跨越式发展战略”不符合欠发达地区的实际情况,小企业集群是欠发达地区在资本、组织和知识约束条件下的最优组织选择形式和实现工业化的必然起点。

广东商学院刘红红博士主要关注发展观的变化对西部大开发的借鉴意义,并据此提出,在西部大开发中,应改变把物质的增长放在经济发展的核心地位的做法;在“收入贫困”与“能力贫困”中,应重点解决后者;强调市场的作用;强调制度建设应有助于实现人们的经济交往和流通自由。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罗良文博士认为,要在加快西部市场化的过程中,完善西部的所有制结构,使之成为制度创新的突破口,并且将调整所有制结构和调节产业结构相结合,通过市场化的过程培育出多种所有制的市场主体。尤其要加快西部国有企业市场化的步伐,才能有效地改变西部地区经济落后的状况。

与会代表不仅从理论上对区域经济进行了阐述,同时还结合各自所在省的实际,阐释了各地在西部开发中所要面对的问题及其对策。

(1)创新是创建陕西强省的必由之路。西部经济强省是一个动态的、综合的、相对的、多层次的、系统的概念。与此相对应,西部经济强省的指标体系具有动态性、综合性、相对性、层次性、系统性等特征。白永秀教授认为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为陕西建设西部经济强省提供不竭的动力,才能保证陕

西实现西部经济强省的动态性目标。西部经济强省指标的综合性决定了陕西需要进行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的创新,构建一个与经济强省指标体系相对应的创新体系,其中包括理论创新、文化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和发展战略创新等。

(2)贵州发展的五大举措。贵州有五大比较优势,处于西南地区南下出海的重要通道和陆上交通枢纽,地理位置好;能源矿藏资源丰富;生物资源丰富;而且贵州国防军工企业众多,有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技术基础和人才基础;旅游业也是贵州比较优势之所在。顾振楠教授认为,贵州要着重解决:提高人力资本存量,大力发展教育。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发展中所需的制度因素。调整产业结构,协调产业间的关系,实现共同发展。发展中介组织,推进农村经济市场化。

(3)新疆的人力资源开发问题。新疆人力资源存在着高层次人才数量少,人才分布不合理以及学历差异大等问题。新疆在人力资源的开发和使用上都存在着不良的社会心理,比如注重物质资源而忽视人力资源的开发;对于人才的再学习、再教育不重视以及固步自封;而在使用上又出现了对于人才的偏见。司正家教授认为发展新疆首要的问题就是注重人的观念的改变,在人力资源开发上下功夫。

3. 契约理论。以科斯的《企业的性质》(1937年)为标志的契约理论是市场经济理论和企业组织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已成为经济学者分析现实问题时所采用的一种普遍的分析工具。这一理论也成为这次会议讨论的一个热点。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赵守国教授指出,在效率标准中存在着效率标准多元性和效率标准一致化并存的效率二重性矛盾。他通过对产权界定收益与成本的比较,提出产权界定最优度原理,指出在产权界定中存在着产权界定最优度,而为了提高产权的界定效率就要从技术上、社会和法律制度等方面创造必要的条件。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张卫东教授主要从交易成本的角度对工资合约的选择进行分析。在他看来,传统的按边际产量进行要素分配的理论存在缺陷,因为交易成本的存在使得对于各要素的边际产量无法测量,进而指出,工资合约的差异在于为了节省界定要素贡献所耗费的交易成本。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宋宇博士则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对合同治理的内在经济机理进行了分析,指出法律对合同的规制必须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合同不完全,而法律制度的建设只有从仅仅强调公平的传统观点向重视效率的方向转变,才能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

4. 经济学方法论。如何评价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以及如何创建中国经济学方法论体系,也是这次会议讨论的重点问题。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石高宏和李灵燕同志在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经济学在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方面所取得的重要进展的基础上,探讨了公平和互惠主义等社会行为规则与企业内的个人行为之间的内在联系,指出社会行为规则与个人行为规则存在着内在关联性,交易过程的制度细节又决定着参与人的策略机会和讨(下转第61页)

3. 技术制度的创新。由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农业的技术研发特别是推广系统的改革,相当滞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那一套全部由国家包下来的无偿服务网络,在市场经济的利益机制冲击下,简直溃不成军。其后虽作了一些修补,但并未解决根本问题。首先,政府与社会的工业城市倾斜,使农业投资机制不断弱化,农业科技投入、特别是基层推广的投入更显不足。如欲进行重大农业技术的研发、中试与推广,往往是捉襟见肘。其次,专业性的农业科研与推广机构普遍设备老化,难以承担像样的研究项目。再次,也是最严重的,基层科研人员由于待遇低、工作条件差,加上外界利益机制的吸引,人才大量流失,甚至后继无人。最后,体制“青黄不接”,渠道不畅,上层农业大学、科研院所与实际农业部门、广大基层农民之间,缺乏“直通车”。信息阻塞,前者缺创新之“源”,后者缺引路之“灯”。

我国农业研发与推广的制度创新,总的来说,应该把它纳入整个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框架内予以审视。这是因为农业产业化决不是“复制古董”,它要求为社会不断提供日新月异的新商品,否则就会丧失竞争力。因此,创新的目标就应该是建立一种研发与推广的新体制,它能够不断适应市场的新需求,提供新品质、新形态、低成本、高效率的品种、耕作方式、生产手段、加工工艺与营销技术;能够及时有效地解决农业生产与经营中出现的各种技术难题。要做到这一点,新体制应具有如下机能:一是整个体制要形成一个既按市场规律运行又可有序协作的竞争性网络。通过此网络,可以在高层教学科研、中层普及推广、基层农业生产之间,信息畅通,责权明晰,利益分享。二是整个体系特别是基层的科研人员队伍稳定,新陈代谢,有强劲的激励机制。三是形成政府与社会相结合的、良性运行的财政与投资机制,可能提供以上改革与发展的财力保障。为此,建议推行如下创新项目:(1)农

业银行开展专业性的农业科技风险投资业务,最好能建立专门机构。(2)政府的农业科技投入,确定一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随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而增长,以确保骨干科研推广机构的正常运转。(3)国家科研基金项目,农业必须占有较多的比重。(4)建立农业院校、科研院所与基层推广站和重点农户之间的热线联系制度(包括定期论坛、信息网站、合作组织、专业协会、定点培训等等)。(5)大力改善基层科研机构的硬件建设和人员的待遇,放开经营机制。(6)学习日本的经验,农科大学毕业生必先定期下基层推广站服务两年,及格后方能考研或转做其他工作。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资本论》,中文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 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中文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3. 薛暮桥等:《中国农村》(论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4. 张培刚:《农业的工业化》,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86。
5. 加塔克等:《农业与经济发展》,中文版,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6. 刘易斯:《二元经济论》,中文版,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7. 夏振坤:《绿色革命之路》,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
8. 夏振坤:《发展经济学概论》,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
9. 毛育刚:《中国农业演变之探索》,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10. 速水佑次郎等:《农业发展的国际分析》,中文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11. 林善浪等:《中国农业发展问题报告》,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
12. 迈克尔·佩罗曼:《资本主义的诞生: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种诠释》,中文版,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13. 庄卫民:《试论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趋势》,载《农村经济问题》,2001(6)。

(作者单位:湖北社会科学院 武汉 430077)
(责任编辑:S)

(上接第54页)价还价能力。这是从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的角度对企业内的合作行为提供了一个新颖的解释。

广州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傅耀博士探讨了在现阶段创建中国经济学自己的方法论的可能的创新道路选择,强调应当摆脱过分依赖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倾向;提出只有从中国的经济现实出发,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和中国传统方法论的作用,将中外方法论的精髓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将中国经济学方法论的创新由可能变为现实。

5. 宏观经济增长。近年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快速的增长,应该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以及未来发展,已经成为国际间的一个热点问题。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的安立仁教授通过对中国1952 - 2002年基本经济数据进行深入分析,建立了以生产函数为AK型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型,其基本结论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是资本投资。

与会代表认为,要实行新的发展观念、战略和模式。人类的发展观、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一般经历了一个从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至上(如GDP情结)到可持续发展(如

绿色GDP观念)的转变,从强调土地、资本、劳动、技术和投资等物质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的古典式经济增长观,到重视制度性因素及其制度创新的转化;历经从供给单因素驱动阶段(依靠廉价资本、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大量投入、规模的快速扩张来推动的高速低效的经济增长模式)——供给和需求双因素驱动阶段到需求单因素驱动阶段,从粗放式数量扩张——粗放式和集约式并行发展转向集约式质量提高模式的过程;历经从均衡——非均衡到协调的区域发展战略,从低收入水平的“要素驱动”战略——中等收入水平过渡的“投资驱动”和“技术驱动”战略到着眼于“创新驱动”的跨越式发展或追赶战略的演变。中国的经济发展应该进入从总量扩张导向转向结构调整导向的增长,从供给要素推动增长转向需求因素拉动增长,从工业化主导带动增长到工业化和服务业共同带动增长,从投资主导刺激增长转向投资和消费共同刺激增长的阶段。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西安 710069)
(责任编辑:Z)